



余干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交流)

10/57/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余干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二月

余干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目录

◇*革命风云*◇

- 红军三打古埠街 彭师鹏 (1)
从《北京人》墙报到进步青年联谊会
——忆故乡黎明前民主斗争二、三事 周孝中 (9)
记余干县抗美援朝运动的盛况 段振国 (15)
回忆赴朝慰问 潘春花 (18)
余干县解放前的社会状况与解放初期
镇压反革命情况 湖风梅、江秋波 (21)

◇*抗日烽火*◇

- 瑞洪抗日保卫战简况 章成宪 (25)

◇*文化丛谈*◇

- 东山书院与朱子《楚辞集注》 古骥云 (28)
余干县佛教祖庭
——「东山禅林寺」 段振国、舒广汉 (33)
邓碧珊生平及其瓷画 吴一党 (37)
余干县广播、电影、电视事业
发展的概况 彭点清、陈文杰 (39)

◇*人物春秋*◇

- 余步蟾先生轶事 余仁昌 (46)
清末武进士——江鸿波 江红珠 (52)
悼念张仲浦老师 余仁寿 (60)

◇*财经简史*◇

- 余干县金融简史 徐英豪 (65)

我县国营商业发展概况 吴承贤 (79)

◇ * 林垦纪实 *

禾斛岭垦殖场的创业史 占骥云整理 (83)

杉林翠盖鄱湖畔

——余干县发展杉木用材林纪实 齐治安 (90)

◇ * 旧事杂谈 *

余干县中苏友好协会活动情况的回顾 段振国 (95)

回忆在台湾凤凰山军校 高俊 (100)

张西点其人 黄文政 (103)

解放前夕余干县政府组织机构简况 胡先 (108)

“一·二·三”事件及历届市判官的概况 戴星球 (111)

元末朱、陈鄱阳湖大战史话 (上) 张永峰 (116)

◇ * 沧桑拾零 *

余干县城地理环境变迁概况 何焕荣 (136)

◇ * 地方风貌 *

余干风貌 政协文史办抄 (145)

关于“水乡泽国”——余干的补遗 张祥江、易文广 (147)

◇ * 来鸿摘录 *

祖国风光好 游子故乡情

——从潘时敏先生的海外来信而怀念故人 吴建威 (149)

读者来信 (摘录) 政协文史办 (151)

◇ * 文史信息 *

政协余干县第六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名单 (153)

红军三打古埠街

彭师鹏整理

一九三零年（民国十九年）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方志敏同志，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余万交界的宝庆峰创建了县苏维埃政权（县苏政府驻五雷乡长源周家），县苏维埃主席是方佩龙（弋阳人），下辖五十个区苏（县苏、区苏、乡苏是县苏维埃、区苏维埃、乡苏维埃的简称。下同），五十二个乡苏（乡苏有乡苏、村苏之分），十多华里，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五雷乡苏维埃驻五雷乡长源周家，下辖二十一个村苏，二十六个自然村，二十六个生产合作社，二十六个赤卫队，二十六个民兵连，二十六个游击队，二十六个民运队，二十六个农运队，二十六个青年团，二十六个妇女团，二十六个儿童团，二十六个劳动团，二十六个文化团，二十六个宣传队，二十六个调查组，二十六个纠察队，二十六个肃反队，二十六个保卫队，二十六个警备队，二十六个侦察队，二十六个通信队，二十六个工农商学兵学校，二十六个红军小学，二十六个红军中学，二十六个红军高级中学，二十六个红军大学。

苏区成立后，

一团、十一团部分红军，在我县苏区赤卫队的配合下，曾多次攻打过古埠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对扩大红军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根据苏区老赤卫队员的回忆和采访的史料，将红军三次攻打古埠街的情况，整理如下：

一打古埠 先发制人

五雷苏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惶惶不安。余干县县长周国光（进贤县人）立即将冬防

队改为警察大队，任命蔡子超为大队长，拥有140多条枪；各区、乡建立了靖卫团、清剿委员会和铲共义勇队等反革命组织和地方反动武装。他们在我苏区边境构筑碉堡、哨卡，阴谋策划对我苏区进行残酷“围剿”。古埠反革命势力尤为猖獗。大土豪饶胜嘉任清剿委员会主席和团长，李淑元任团总，恶霸地主饶华谷（万年县人）任铲共义勇队队长，拥有三十多条枪。“清剿会”驻古埠街的资福寺。

面对反革命“围剿”的紧张局面，县委和县苏主要领导人于七月十三日在里源卢家卢凌云同志家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叶曾同志（叶乾象，任红十一团政委）说：“周国光这个家伙没有什么了不起！朱培德（军阀，江西省主席）也被我们方志敏拖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我们要来个先下手为强，打他个措手不及！”方佩龙同志说：“对我苏区威胁最大的是古埠的饶胜嘉和饶华谷，我们应先打古埠。”杨俊德同志赞同地说：“对，我们应先发制人！”叶蓉同志果断而又郑重地说：“机不可失，后发则受制于人。”当即派谢宏南同志化装潜入古埠侦察敌情。谢宏南是古埠人，机智勇敢。他带领一名赤卫队员夤夜潜入古埠街一个亲戚家里，侦察和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和防守情况，翌日清晨赶回长源，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当即决定进攻部队由红十军十一团所辖直属队和县苏区赤卫队组成三百人的进攻部队。他们五人一组（一人一付担架、两人荷大刀、一人背枪），于七月十四日下午整队出发。出发前，叶蓉、方佩龙等同志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战士们听说要打仗，一个个磨拳擦掌，精神抖擞。部队从里源出发，经邹源，从福寿庵涉过小河，然后英

分两路：一路由方佩龙、卢世美同志率领，经江头史家坂上在树林中埋伏，直逼反动巢穴——资福寺；另一路由杨俊德、谢宏南同志率领，夺取中桥哨卡，控制古埠行。是夜，月白风清，光照旷野，百步见人，部队迅速进入出击阵地。这时古埠街万籁俱寂，中桥哨卡上两个士兵坐在那里前俯后仰地打瞌睡。谢宏南带领三个战士，沿河匍匐前进，跃上泊在河边“树竹行”的竹排，轻手轻脚地将竹排浮到中桥桥下，攀着桥壁，纵身跃上桥头哨卡，两个士兵突然惊醒，正欲吆喝“什么人？”时，谢宏南和另外三个战士用铁链般的手卡住了他们的脖子，很快缴了他们的枪，完全控制了中桥桥头。与此同时，埋伏在江头史家后面树林里的战士，也摸进了资福寺门前的哨卡，一枪打死了哨兵。这枪声就是信号。红军听到枪声，冲进街头和资福寺，高声呐喊：“红军来啦！缴枪不杀！”资福寺院里的士兵来不及抵抗，仓惶从后门往下埠方向逃命。这一次缴了四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还有许多军衣、军帽。

由于国民党的烧杀、恐吓和欺骗宣传，古埠街的群众听到枪声和喊声，都不敢贸然开门。也许是风声早就传到了这里，古埠街的土豪劣绅都已溜光了。不过，人跑了，东西跑不了。在几家奸商和地主家里，我们没收了食盐二千余斤，红布两匹，红线、中药等也不少。之后，部队返回史家坊，驻扎在当地土豪史尔荣家里（史尔荣早溜跑了），把土豪家的肥猪、鸡、鸭宰来让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然后把从土豪奸商家里抄来的浮财捆扎妥当，胜利返回五雷苏区。

这一次打古埠，大灭了国民党土豪劣绅的威风，大长了

我苏区军民的志气，使红色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苏区歌谣：“南塘府，邵源县，里源卢家是金銮殿。”正是苏区巩固发展的见证。

二打古埠 战果辉煌

一打古埠之后，国民党随即对我苏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清乡”，不少革命干部惨遭杀害，如著名的赣东北枪支采购交通员白海同志、信江游击队负责人卢世美同志，还有革命骨干叶青蒲等六十余人先后英勇牺牲。我县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九三一年四月，方佩龙、叶珍珠、杨俊德、徐定山等同志又回余干进行秘密工作。不久，革命又掀起了高潮。一九三二年五月，邵式平同志（化名邵棠）再次来余干视察，他指示要为重建苏维埃政权而努力。五月二十日在塘石再次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改组了中共余干县委员会。方佩龙任县委书记，叶珍珠任县苏主席，徐定山任军事部长，谢宏南任肃反委员会主席。同时恢复了游击队（队长阮洪标），还建立了驳壳队、梭标队，开展打土豪、“平债分田”运动，我游击队主动攻打白区据点，扩大红色根据地。

当时，县长彭作霖（萍乡人）派保卫团张森春率 30 条枪驻守古埠街。他们在章家桥、上桥、饶家、菊花塘筑了简易碉堡，还在中桥做了垛靶，在资福寺设有武装岗哨，每夜防守，一有情况，中桥哨兵首先鸣枪报警，资福寺即可应战。

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夜晚，国军派张禾山去苏区侦探。

他很害怕，不敢到苏区去，躲在张家湾吃了西瓜，便回去谎报军情：“今夜无事，放心睡觉。”是晚，方佩龙、谢宏南率红十军二团之一部和赤卫队约三百人（配有三十条枪），从长源周家出发，经上太和、口口至南岗坂上埋伏。谢宏南带领两个战士化装成贫苦农民，来到章家桥哨卡，哨兵吆喝：“干什么的？”谢宏南不慌不忙，装作愁苦状态，以哀求的口吻说：“老总，做做好事！我爹爹病重，到古埠街上点（买）帖药，行个方便吧！”接着便从怀里取出药单递给哨兵说：“请老总过目”。一个士兵将药单拿到哨卡门前挂着的马灯下观看是否有假，另一个士兵也忙凑过来鉴别。正在他们观看之际，两个战士乘其不备，倏地将匕首插入两个士兵的腰窝，只听得“哎哟”一声，两个士兵就呜呼哀哉见阎王去了。方佩龙同志指挥伏兵迅速进入中桥，然后又兵分三路：一路摸掉上桥哨卡，一路封锁街道，一路直捣资福寺。方佩龙吩咐停当，就带领主力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干掉了菊花塘和饶家的简易碉堡，然后又来一个猛虎掏心，直捣反动巢穴——资福寺。资福寺守卫霍元甲，听说红军来了，吓得发抖，正想溜走，被我红军战士一枪击毙。接着枪声四起，院里二十多个官兵惊慌失措，来不及反击，仓惶从后墙翻越逃命，被我红军杀伤大半。这时，方佩龙带领红军在院内进行搜索，发现墙角下躲着一个人。方佩龙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那人扑地跪下，两手举起，全身颤抖，连声哀求：“红军饶命。”方佩龙喝问：“饶华谷到那里去了？”那个士兵忙答道：“他到万年家里去了。”方佩龙不再追问，交两个战士绑了，又继续搜查了

一回，便命令部队到街上集合。

这次战果辉煌，共击毙、击伤国民党军十多人，缴获步枪26支，没收奸商食盐二千多斤，还有红布、中药材和地主不少浮财，在街上张贴标语，向群众宣传。不少店铺开门点燃鞭炮欢迎红军。红军在古埠街吃了早饭，高兴地迎着朝阳返回苏区，沿途又散发传单。在途经勒马桥时，因捉拿饶胜嘉未获，遂将他老婆史氏和侄女带往苏区做人质，要饶送一千块银元赎人。此仗之后，地方赤卫队有三十余人参加了红军，随同红十军二团之一部，由方佩龙同志率领，经黄埠开往余江，驻扎在余江县鸭脚树下（村名），休整待命。

三打古埠 声东击西

二打古埠之后，古埠反动武装几乎被我全歼，清剿委员会没有武装也“清剿”不了，土豪劣绅没有武装保驾，也纷纷逃往县城。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三日，红军三个团加上赤卫队共一万人，一举攻占了余干县城。县长因“县城失守”被“革职议罪”，饶胜嘉也乖乖地送来了一千块现洋，我方释放了饶的老婆，可是饶的侄女（在饶家做奶娘，是穷苦农民家庭出身），看到苏区这样好，要求说：“我爱这里的自由生活，让我留在这里帮战士弄饭、洗衣吧！”可见当时苏区是何等地吸引穷苦人民！

但是国民党并不甘心穷苦人民翻身。他们撤掉了彭作霖，马上委任程觉吾（新建县人）为县长，组织余江、万年、余干三县联合对我县苏区进行“围剿”，同时，为了整

赣余干县警察大队，正在拟派国民党 53 师来余干驻防。于是九月十五日爆发了震撼省内外的罗英率部起义。不久，罗英、方佩龙、徐定山、胡山等同志率领红军第二次攻入县城，从而粉碎了三县联合“围剿”我苏区的黄粱美梦，国军 53 师也不收轻易来余干驻防。由于斗争需要，我红十军由方志敏率领，离开了赣东北苏区而进军闽北，我县苏区革命力量相对减弱，革命又处于低潮。于是反革命气焰又嚣张起来。古埠的饶胜嘉、饶华谷强逼古埠商民凑钱买枪，先后筹措了三十条枪，决定向苏区骚扰。同时，黄埠的反革命分子江林善、刘风书也准备血洗苏区。这时，我苏区面临腹背受敌、南北夹攻的处境。于是我苏区主要负责人方佩龙、叶珍珠等同志研究，决定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故意把苏区赤卫队集中起来，摆出要大打黄埠的架势，暗中却调遣部队，出敌不意，攻打古埠街。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苏区派黄国定、谢宏南潜回古埠侦察敌情，果然不出所料，古埠防守薄弱。当天晚上，方佩龙再次率领红军游击队、梭标队四百人，配有六十支步枪；十二支驳壳枪，以迅雷般的行动冲进了古埠街，不费一枪一弹，国军十余人全部当了俘虏；缴获步枪三支，军毯十几条，子弹若干；没收奸商棉花四袋（做军衣用），布匹百余丈；打死土豪洪森元的媳妇，并张贴标语。途经勒马桥，又第二次捉拿饶胜嘉未获，红军游击队于是抄了他的财物，放火烧了他的房屋，然后凯旋返回苏区。

事后，县长程觉吾气得暴跳如雷，大骂饶胜嘉和饶华谷是“饭桶”。而饭桶也不示弱，对程反唇相讥说：“没有想

到方佩龙会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打法，结果弄得我们损人丢枪，无家可归。县长“围剿”黄埠，总该大获全胜吧！”原来“围剿”黄埠败得更惨，程觉吾县长被两个“饭桶”羞得面红耳赤，于是又大骂起江林善、刘凤书也是“饭桶”来。



从《北京人》墙报社到进步青年联谊会 ——忆故乡黎明前民主斗争二、三事

周孝中

在解放前一两年间，我县一批从南昌、波阳、景德镇等地求学的青年，陆续以高中、高师毕业而回归故里。其中有张匡亚、张澄亚、孙福茂、朱德熹、周虬、章光德、徐振家、张乐群、邵国显和我等人。由于我们大都是玉亭中学先后同学，初中既有同窗之雅，高中又加同乡之谊，彼此之间较为熟悉，因而时相过从；特别是当时社会环境险恶，反动政府的内战、独裁政策，使大家感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且又遭受“毕业即失业”的痛苦，即使高师毕业分派小学教职，亦因教育经费无着，每月只领“不敷经费”的空头支票，有职也与失业无异。共同的遭遇，使大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时常在东山岭、琵琶洲聚会。回想当年也有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大家都想对家乡有所作为，曾拟编印一种刊物，取名《民主启蒙》，以唤起乡人，为民主而斗争。但编印刊物，纸张印刷，所费不资，几经奔走，深感筹措经费的困难。连一些亲友也因怕文字惹祸不予赞助；我们也曾想大家积极撰稿，投诸报刊，以换取稿费，但也行不通。当时《民国日报》、《中国新报》曾刊登我们投稿，如我的《豪门石崇考》及《晓斋随笔》连载十数则，却无分文

稿酬寄来。我们感到编印刊物，真非身无半文的穷书生所能办到的。后得友人介绍西南联大“民主墙”的做法，大家觉得所费不多，切实可行。乃决定编写墙报，在我县推出一道“民主墙”来，为民主运动开辟一块阵地。并确定针对国民党搞“制宪”、“行宪”、“还政于民”的把戏，我们就揭露其虚伪民主，抨击其腐败政治，并力求结合乡土实例，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确定了目标，就分头进行调查，经过研究，写出好几篇有一定份量的文章。其中有揭露“国大”选举丑闻的；有反映人民苦难的；记得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揭露新县长郑某贪赃枉法的文章。文中提到某劣绅为得到×乡粮仓主任之职，亲到郑县长私寓与郑妻讨价还价，当双方坚持不下时，郑某亲自出马，把灯吹熄来讲价钱。这篇文章绘影绘声，言之有据，可谓传神之笔。这批文章作为首期墙报刊出。临时又确定以《北京人》为墙报名称。因为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中国猿人”，又称“北京人”，我们就以老祖宗的名义来教诫不肖子孙。这份《北京人》墙报，堂而皇之地贴在县参议会墙上。当时正是参议会开会之期，我们一早去张贴，到开会时，各乡参议员和县府主管人员就成了第一批读者。只见他们有的面红耳赤，强作镇定；有的指手划脚，点头微笑。唯独那位武人出身的郑县长，稍一露目即气急败坏，叫嚷是“奸党破坏，要追查严办”。当时也引来一些看热闹的人，包括我们这班同学，装着若无其事。目睹贪官污吏们的表演，不禁暗中叫好，一丝丝成功的喜悦，涌上心头。

此后不久，我们的几位同学在东山书院聚会时，发现有

人跟踪、偷听，甚至借故要签名和笔答；还有自称县府“秘书”的人，到我家索取郑掷之子的作文簿（郑子是我所教六年级学生），据说县长要亲自审阅其子的作业云，我觉得很蹊跷，就借口作文簿放在学校，约其明日来取，当晚我和几位同学研究了这些情况，意识到郑某此举是为了查对墙报笔迹，我就将自己所批改的文字，故意加上淡红墨水，使之渗开淡化，模糊不清，笔迹也就难以辨认了。

郑某查对笔迹企图未能得逞后，又派人到玉高中学查找线索，于是爆发了触犯众怒的殴捕教师事件。

当时玉中仍一如既往，弦歌不辍，秩序井然。突然来了几个军警特务，在课堂廊间横冲直撞，鬼鬼祟祟，是多么不协调啊！不期然地碰上了从协和大学毕业归来的青年教师卢锡宝，而且不客气地质问他们“是干什么的？”这帮家伙因数日来未能破获“奸党”，屡遭斥责，加上胡作非为惯了，便不问青红皂白，扭住卢老师推出校门。一边走，一边拳打脚踢，迳往下关而去。

这时尚未下课，大多数师生都在课堂内，只有个别同学见此情形报告办公室。学校当即召开紧急会议，校长张梦祖在省城未归，由董事长周显主持。决定暂不惊动全校，先派几位教师代表前往县府办理交涉。董事长气愤地说他自己不顾年老体衰，一定要去。在场老师也纷纷要求前往，连平日埋头教学不问政治的周旋老师也执着地表示：“多年未进过衙门，今天我倒要进去，官僚如此横行，书也教不下去了。”于是周显率领着周旋、查大镛、张泗安等颇有声望的老教师前往县政府，至则声称要面见县长，几经挡驾，强而

后见。周显第一句话就是：“既然说是行宪时期，为什么胡乱抓教师，扰乱学校？”郑县长推说：“不知有这种事，可能是误会。”老师驳斥道：“抓人者是县府军警，被抓教师已关进县警察局，县长岂能无知若此！”郑掷已知推不掉，乃答应“马上查问，有抓必放，请老师们放心回校。”周显进而严正指责：“执法者如此肆无忌惮，知法犯法，问题太严重，这对制宪行宪，是一大讽刺，我们要求一定要惩办凶手，追查主使者的法律责任。要保证卢老师人身安全，等我们见到卢老师询问受害情形，再提处理意见，我们保留追究肇事者的权利”。

正当周显等代表进入县府办理交涉时，县城几所中小学负责人和教师纷纷到三中探望，注视事态的发展。各校来人随即聚集到铁井街嘉宾楼，商讨对策。初步决定，成立县城中小学教师联谊会，共同为抗议县府军警无理殴捕教师，侵犯人身自由，破坏教学秩序的暴行而行动起来，若县府当局不立即依法合理解决此事件，县城各校教师当即举行罢教。为表达大家的意志，立即推定邵鹏健（玉中）、周孝中（一小）、张梦学（二小）等人起草《致县府当局的抗议书》、《罢教宣言》及《告全县同胞书》。

正当嘉宾楼群情激愤，起草者铺纸呻吟之际，事态突然出现逆转。这是由于“官官相护”的封建官场规律在起作用。原来是作为“民意代表”的参议长张恭宾，他压根不代表民意，却热衷为欺压人民而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官僚去排难解围。就是这个议长，作揖打拱请卢老师坐上披红挂彩的轿子，送回学校算作道歉；延请李锦医生为之治伤，奉送一笔

钱养伤，并作为赔礼；同时为消除教师们的怒气，又在嘉宾楼摆下筵席以作圆场。于是一场抗议官府欺压教师的正义之火就此扑灭了，这其间都没让负有主要责任的县长花钱和出面，这使不少教师感到不满。我也没有赴宴，因为不愿见那“和事佬”圆滑可憎的嘴脸。

由《北京人》墙报引起的风波，至此告一段落。郑掷这个黄埔四期出身，长期在新军阀队伍养成法西斯作风的反动家伙，再也沒功夫去追究与文章揭其劣迹的人，因为他声名狼藉已传到京城，使他的后台也感到不安。他花巨资运动得来的乌纱帽，竟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任期未满一年的短期内就甩掉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振奋人心的消息，先后给我们山城带来喜讯，特别是蒋介石的“引退”，使人们更感到蒋家王朝败局已定。此时，我们这班同学，多方面收集革命战争胜利消息和有关政治资料进行学习，并时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定要举起双手，迎接解放，盼望好时光早些到来。于是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余干进步青年联谊会”，在县城一小（考棚）礼堂开过一次会，到会除前面已提过的同学外，还有县城青年教师张自成、周生三、戴太源、舒肇太、宁光华、洪勋、孙达、张果达、周国述、孙尊权等（记得当时礼堂就坐的人，不止这些，恕我未逐一写出姓名）。

会上谈了时局发展趋势，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一面要准备迎接解放；一面要提防国民党军队拉人。要求大家互通声息，一致行动。会后，我和福茂、光德等用红绿纸书写了